

社會缺乏法治基礎

非經濟因素嚴重干擾經濟發展

中研院院士、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麥朝成則在研討會上表示，1980年代至今，國人同步追求政治民主化、經濟自由化、社會多元化，其間雖然為無數中小企業開創活力空間，但因為整體社會缺乏法治基礎，政治民主化偏向民粹民主，導致亂象叢生，形成非經濟因素嚴重干預經濟發展的不利現象。

麥朝成特別指責過多且密集的選舉活動，擾亂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，每次選舉都讓國民所得又一次重新分配，國人已為民主付出代價、讓經濟帶來負面影響。他以公元2000年的總統大選與隨之出現的政黨輪替為例，其間挑起的省籍意識、勞資問題，都是社會資源的浪費，內耗全民力量，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，就是於2001年出現五十年來第一次的經濟負成長。

在一九八二年「棲蘭之會」前，已開始對經濟自由化有所需求，當時政治上的威權體制，對經濟發展的目標明確，因此一路施行經濟自由化的各項政策，從外匯、進



◆麥朝成。

口品配額等開放，沒有停頓下來，及至八〇年代在美國三〇一條款壓力下，再度加速自由化。

一九八五年的「廣場協定」，促成新台幣大幅升值，造成整個經濟結構的改變，過去賴以比較經濟利益的勞力密集產業，不得不移到東南亞，隨後又轉進中國大陸，一九八七年因政策上開放對大陸探親、觀光，兩岸開始密切交流。

麥朝成表示，過去台灣內部「單純的」非經濟因素，如今加入兩岸議題和區域意識，面對政治上與台灣有離心力的政治實體，但經濟上卻是愈來愈密切的經濟體，



◆勞思光。

這全是過去三十年未曾碰觸過的，而思考複雜性也更大，國人才會陷入不知何去何從的迷失。

面對今天全球化的衝擊、兩岸互動關係，麥朝成認為，國人應秉持昔日打下的深厚基礎，運用珍貴的本土人力資源、生活品質，積極充實最重要的投資環境，從多方面塑造良好條件，讓企業界願意留下來投資，大家一條心共同打拚。

從多位知識分子的喟嘆與憂慮，也可看出台灣當前的民主實踐，仍存有諸多未竟之志業，諸多嶄新的挑戰，亟待大家去面對與克服。二十多年前知識份子所面對的



◆李鴻禧。

課題，是怎麼在森羅嚴峻的威權緊箍中，打造民主多元的體制結構與運作機制；如今知識份子所面對的課題，則是怎麼在權威解構、價值紛陳與認同失焦的情境中，鞏固一個理性思辨與符合正義的「公民社會」。二十年前的知識份子可能面對來自威權強控制體的打壓、圍剿與詆毀，二十年後的知識份子卻可能必須面對來自民間社會內部的區隔、標籤與質疑。結果二十年前無懼威權當局威嚇，坦蕩直言的不少知識份子，如今卻可能在種種政治正確的質疑下相繼噤聲。